



朱诚如
主编

清朝通史

雍正朝
分卷
冯尔康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通史·雍正朝/朱诚如主编, 冯尔康分卷主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047-382-1

I. 清… II. ①朱…②冯…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337 号

清 朝 通 史

主 编 朱 诚 如

雍 正 朝 分 卷

主 编 冯 尔 康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88 千字 印张 17 12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047-382-1/K·179

定价: 42.00 元



总 前 言

历时 4 个寒暑，由全国数十位清史专家学者辛勤撰写的《清朝通史》12 卷 14 册即将付梓，作为全书的总主编，谨赘数语，以为前言。

自清末迄今，近代的清史研究已经走过 90 多年的风雨历程。经过几代清史学者的辛勤耕耘，清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术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传统史学、实证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份被抛弃，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史学界全面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清史研究随之进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学者们高度重视从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的角度考察清代历史，学术界关于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清代阶级关系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史研究的面貌，使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认识，从历史的表象进入到深层，从上层建筑深入到经济基础。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但扩大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而且加强了清史研究的科学性。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既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清史研究取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思想在解放，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扩

大，研究水平在提高，清史研究逐渐形成充满朝气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断代史著作的大量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郑天挺《清史简述》、鄂世镛《清史简编》上编、戴逸主编《简明清史》、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戴逸和李文海主编《清通鉴》、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等。这些著作尽管风格不一，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学风严谨、勇于创新是其共同特点。此外，一些中国通史的清史部分，资料翔实，结构完整，也可以说是高水平的清史断代史著作。如蔡美彪主持撰写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史稿》第7册，等等。上述这些断代清史著作都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从综合性的角度，全面把握清史发展的脉络，探寻治乱盛衰的根源，反映了当代清史研究的水平^①。

我们这部《清朝通史》，基本上借助于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采用专题的形式，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于清代自兴起到灭亡300余年历史中所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军政大事，逐一进行比较翔实的述论，既考订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有专家学者的点睛之评，目的在于以这批学者积年所得撰写的这部著作，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从中受到启迪，并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清代历史，如果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代明而立，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朝被推翻，前后有268年；如果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算起，前后有328年；即使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元称汗算起，前后也有295年的时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清朝

^① 参见高翔：《五十年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

经历了孕育、发展壮大、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历史也经历了由古代到近代、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为了充分展示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揭示其经验教训，本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写起，直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

作为《清朝通史》附录的《清史图典》12册已经先行付梓。《清史图典》收录了近5000幅与清朝历史相关的图像，其中有1/3是第一次见诸出版物。这些图像，或藏之于皇宫，或散失在民间，或流落于海外，我们尽力予以搜集和筛选，意在通过文字和图像相结合，使读者对清朝历史有一个感性认识，加深对清朝历史的理解。

全书由朱诚如教授任总主编，并负责总体设计、规范体例、撰写总序、全书终审。各分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具体分工如下：第一卷主编朱诚如教授；第二、第三卷主编阎崇年研究员；第四卷主编李治亭研究员；第五卷主编王思治教授；第六卷主编为冯尔康教授；第七卷主编周远廉研究员；第八卷主编张玉芬教授；第九卷主编喻大华教授；第十卷主编马东玉教授；第十一卷主编余同元教授；第十二卷《大事记》主编孟宪刚教授。对于参与全书撰写工作的各分卷主编和其他学者的通力合作深致谢意。

为便于读者核对资料，本书的注释采用篇目和页码相结合的方式，每卷在首次使用某种史料时均注明版本，如“《清史稿》卷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四，第833页，中华书局，1986年”等。

本书中的数字表述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方式，但也有某些篇目为庄重计保留了汉字表述方式。谨做此说明。

由于清史时间跨度较长、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又头绪繁多，真正动手写作的时候颇觉踌躇，好在及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学术单位众多学界前辈和师友的支持和鼓励，从而使我们有信心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同时，由于该书体例目前还只是一种尝试，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希望得到诸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文化部、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著名学者启功先生为本书和图典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朱诚如

2002年10月于北京



导 言

雍正朝只有不长的 13 年（1723—1735 年），却产生了一系列在清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为重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事件，一定程度上清理了历史上的积弊，使清代社会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继续向前发展，它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政治改革的时代，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本节将从政治史的角度，叙说这个时期所承绪的历史遗产，主人公雍正帝的政治思想和抱负，朝廷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革新和出现的政治斗争及事件，期望能够基本上概括出时代的特点。本节因系概述，所涉及的史事，大多会在有关专题中做出较详细具体的交代，所以这里从简，一般也不注明叙述材料的来源。

（一）

雍正帝的继位，迥异于通常情形下皇位的传承，是在康熙后期十几年激烈的储位之争中上台的，又是康熙帝在弥留之际一言而定的，这就容易令人产生新君登基合法性的疑问。换句话说，多年的政争不会立即消失，将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1. 康熙后期储位斗争和储位虚悬

雍正朝的主人公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是康熙帝序齿的第四子，生母德妃乌雅氏，受孝懿仁皇后抚养。21岁（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为贝勒。

废黜皇太子与储位虚悬。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发生了举朝震惊的废太子事件，康熙帝鉴于业已册立34年之久的皇太子允礽的不仁不孝，突然宣布将他废黜。皇子中有人结党谋求虚位的储贰，康熙帝遂命朝臣举荐新太子，大学士马齐等人联手推荐皇八子、贝勒允禩，康熙帝以群臣有私心而允禩不足为储君拒绝接受。此时君臣受着国家必须有储君的观念影响，而皇子中又没有适合的人选，康熙帝不得已于次年重立允礽为皇太子；为了消弭废立太子事件中皇子间的纷争裂痕，册封诸皇子，允祉被封为诚亲王，雍正帝晋爵为雍亲王。允礽不知悔改，康熙帝于五十一年（1712年）再度将他废黜。此后不断有朝臣要求册立太子，康熙帝拒不考虑，直至辞世，不立储贰，致使储位虚悬11年。

诸皇子结党谋求储位愈加激烈。没有储君，遂使一些皇子结党谋取这个位置，形成几种势力。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受命于蒙养斋修书，身边聚集了一些著名的文人，有着令人瞩目的声誉，但是不善于制驭下属，属人两度犯案，康熙帝曲加优容，自然会认为他柔弱不能理事。皇八子贝勒允禩被朝臣称为贤王，以仁义为政争纲领，并得到皇九子贝子允禔的拥护，原来也获得皇十四子允禵的支持，潜在势力颇强，但是康熙帝认为他阴险，比废太子可怕，所以屡加压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骚扰哈密，西北战事兴起，清军屡屡失

利。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任命皇十四子、贝子允禩为大将军王出征，他于五十九年驱逐准噶尔在西藏的势力，遏止准噶尔的攻势，在储位争夺中犹如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他是雍正帝的同母弟，却与允禩亲近，在军中从允禩处获取宫中、朝中信息，听信算命人之言，以为自家“玄武当贵”。这时的雍亲王雍正帝为谋取储位，制定了全面的计划和策略，力图给人闲适读书的印象，与僧侣交游，纂辑《悦心集》一书（雍正四年，1726年刊刻），表示恬淡无为，不争储位，暗中培植门下势力，并有目标地猎取朝臣；侍从康熙帝南巡江浙，西幸山西五台山，东临满洲发祥地吉林，奉命盛京祭祖陵，遵化祀陵，曲阜祭孔庙，康熙末年两次代行郊天礼，此外别无重要差使，然而获取康熙帝的“诚孝”之誉；他的不动声色、外弛而内张的活动手法，可能蒙蔽了康熙帝，麻痹了政敌。综观各种迹象，康熙帝在季年可能会在允祉、雍正帝和允禩3人中选择继承人，而雍正帝与允禩这对同母兄弟的机会或许更大一些。

2. 众人疑惑心态下的雍正帝继位

康熙帝于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日得病，到离宫畅春园休养，十三日凌晨因病情危急，召见允祉、允祐等7位皇子和国舅、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由雍正帝继承皇位的最后政令：“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同时将雍正帝从祭天斋戒处所召至畅春园，三次见面，然未言及嗣位之事。当晚康熙帝驾崩，隆科多传达遗言，由雍亲王胤禛继位，改元雍正，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

皇位授受之际，由于储位虚悬和诸皇子党争已久的客观形

势，又没有康熙帝的亲笔遗诏，失败者难于接受新的现实种种因素，故而雍正帝的突然龙飞九五，致令时人以及后世研究者产生他的继位是否符合康熙帝意愿的问题，以致现今出现四种歧异说法：一是说康熙帝遗诏传位皇十四子允禩，被雍正帝伙同隆科多篡改，夺了乃弟的皇位；二是说康熙帝平日已对雍正帝有好感，临终之际令其嗣统；三是说康熙帝并未指定继承人而突然故世，雍正帝乘机登基；四是说康熙帝瞩望雍正帝嗣承大统，而令允禩辅弼，然而雍正帝没有善待乃弟。雍正帝继位异说，由于历史文献未能提供关键性的资料，使后世学者难于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所以诸说并存。就本卷作者而言，相信雍正帝是依照康熙帝遗愿继承的皇位。

3. 皇室与民间的新事件：继位余波

雍正帝的顺利继位，结束了皇室内部并将朝臣卷进来的储位斗争，但是它像任何事物一样，不会消失得干干净净，特别是这样长期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失败者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会做困兽之斗，这时最有利的手段就是质疑新君继位的合法性。雍正帝对于储位之争中的旧恨不能从心头消除，而质疑又增新仇，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的争斗已不是储位问题，而是质疑皇权与保卫皇位的性质。在新的斗争中，掌握皇权的雍正帝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采取分化瓦解政敌的方针和策略，开始以“擒贼先擒王”的手法，册封允禩为廉亲王，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但不予实权，加以控制；将允禩发配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严命催逼上路，连父皇康熙帝葬礼亦不许参加；先将允禩囚禁于遵化的康熙景陵，后来圈禁在京城景山寿皇殿附近；打发敦郡王允禔为在京故世的喇嘛去蒙古送葬。令他们分散四方，无法合谋

反抗。随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致死允禩、允禩。

允禩等人生前通过下属人员散布雍正帝篡夺皇位的言论，根本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但是他们所传播的流言，为民间所乐道，于是为反对清朝统治的汉人所利用，于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湖南生员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据传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后裔），劝其举兵反对朝廷。雍正帝借此机会，制造吕留良文字狱，炮制以曾静悔过为名的《大义觉迷录》，宣传他嗣位的合法性，以及满人统治的合乎中国传统，希望以此在舆论上改变自己的形象，以合法继承人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心目里。不过事与愿违，《大义觉迷录》留下了关于他篡夺允禩帝位的民间传言，为后世篡位说提供了历史资料。

雍正前期，雍正帝与允禩等人的斗争是康熙朝储位之争的延续，不过具有争夺皇位的新意。储位——皇位之争，如果从废太子允礽与大阿哥允禔结党相争算起，至曾静案截至，前后长达40年，激烈时期竟有15年，它给康熙、雍正两朝历史进程和两位帝王的生活以巨大的影响，并关乎对他们的历史评价。

（二）

雍正帝继位之初所面临的形势，不简单的是皇室内部的党争，更广阔的是前朝遗留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方针政策，还有新朝的新形势和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政策来处理好各种政务。

1. 康熙朝正负面的政治遗产

康熙帝是有杰出历史贡献的帝王，但他的业绩主要产生在康熙前半期，而后半期则颇为逊色，他留给雍正帝的遗产，是一个

大帝国，是一整套的治国方略和制度，是好坏参半的政治与社会情形，需要雍正帝去消化，去更新，以便谱写社会新貌。康熙帝的政治遗产，综合其正负两方面，可以归纳出下述数点：

(1) 皇家内部党争。前面业已言明，此处从略。

(2) 宽仁政策与吏治不清。康熙帝于五十年（1711年）宣称，“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①。宽仁，是对官与民两方面讲的，在对官员这一面尤其明显。州县官的加派私征，除自肥之外，用以打点上司，造成吏治败坏。康熙前期对此加以制止，后来明智的官员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建议有限度地承认加派，将收入部分地归于公用，以减少地方官的横征暴敛。可是康熙帝不愿承担加派的罪名，不予采纳，于是只能姑息养奸，使吏治不清成为难于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3) 解决中的西北边疆民族事务。对于准噶尔部的进攻，虽然取得遏制的成效，但仍处于守势。用兵很有必要，然亦有诸多不良影响：开销巨大，造成国库仅存银800万两；部分官员和军士厌战，遭到康熙帝严刑处罚；一定范围内破坏了军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一些困苦。

(4) 经济政策与民生。康熙帝于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即固定人口税，减轻农民负担。同时施行保护富民和优待绅衿政策，有的官员提出顾恤贫民的摊丁入亩主张，户部以不便更张成规予以否定。由于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的积累，康熙晚年江西、浙江、河南、湖广、山东和台湾出现小股民众运动，而以朱一贵暴动闻名于后世，有的暴动余部坚持活动到雍正初年，至于秘密宗教的活动更是绵延历朝。

(5) 满汉矛盾和八旗生计。满汉的差异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五，第433页，中华书局，1985年。

之一，时隐时显，朝中每有大事，常常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①。有不同政见是正常现象，但以满汉区分阵线，则是双方不协调的表现。汉人大学士李光地等人瞧不起满人同僚嵩祝，康熙帝乃启用废太子事件中撤职的能人马齐，以维护满人的优越地位。清朝优待八旗满人，供给他们衣食，造成他们不善生财，随着王朝的延续，他们的生活日趋艰难，康熙时期虽说尚不严重，但八旗生计问题开始显现出来，需要当政者思考对策。

(6) 对西方国家和传教士的认识与接触。康熙后期西洋传教士改变明末以来的传教方式，致使清朝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驱逐部分传教士。沙皇俄国正在向东方殖民，清朝同它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此后俄国使用支持蒙古人中野心家的策略侵扰中国，清朝考虑到蒙古的因素，为稳定内部，时或对俄国让步，允许其商队和东正教教士进京。这种待遇后来为其他西方国家所企羨，并要求效法。从总体讲，清朝君臣对西方国家和教会缺少知识，认识不明。别国东进，清朝处于被动地位而不自知。

(7) 思想观念上的守旧。许多社会问题的不能妥善解决，同思想认识有着很大关系。康熙帝在晚年，由于倦勤和身体状况等因素，产生较为严重的守旧意识。五十年三月他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即此意也。”^② 五十六年（1717年），他进一步说：“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立异，亦不必徒为夸大之言。”^③ 不生事的指导思想导致对兴利除弊的缺乏认知，只好听任社会矛盾的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第609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五，第436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第700页。

积累，以致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治危机，留待后人处理。

2. 雍正帝的革新思想和政纲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与允禩针锋相对，产生严猛施政的设想。他的四十年藩邸经历，也使他深入了解政情和民情，即位后自负地说，“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①，他对接受政权时的社会现实确有比较符合于实际的了解；即位后的局势，有着亟待处断的政事。这三种因素，使他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其要点有下列诸端：

(1) 兴利除弊的革新思想。雍正帝自云：“雍正改元，政治一新。”^②“政治一新”，是他的愿望和宣言，也是他的从政纲领。他要刷新政治，让社会变出新面貌。新与旧是对称的，不破旧就不能立新，所以他在即位当月，要求大学士、尚书、侍郎提出变革时政的建议：“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③迫不及待地表示要采纳谏言，革除时弊。其实时弊往往是积弊，是历史流传下来的，而非一时小弊。就吏治问题，他宣称：“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④又针对科举弊端，说他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则天下永享太平”^⑤。自唐代正式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已有长达千余年的历史，雍正帝要清除的是千年积

①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327页，中华书局，1993年。

② 《穆堂别稿》卷一八，《漕行日记》，乾隆十二年刊本。

③ 《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北楼书局藏板印本。

④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第935页。

⑤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第959页。

弊，“振数百年之颓风”，是多么大的胃口！他所指向的吏治、科举是社会弊端之荦荦大者，所涉及的对象正是政府所依靠的骨干力量，竟然要向他们开刀，具有多么大的勇气！正是以此为目标，才能抓住根本，实现“端治化之本”。雍正帝反对因循守旧，主张振兴，同康熙帝晚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墨守陈规观念相对立，他确实具有除旧布新的改革思想，这是他的政治思想总纲，各项政策的制定均源于此。

(2) 为政务实的思想。利与弊总是相伴而生的，兴一利必生一弊，有弊则会招致骂名，连“利”也容易被一起否定掉，是以“不生事”、“安静”成为徒慕虚名的执政者的信条。雍正帝要改革，就需要破除这种观念。他在即位一周年之际，告诫臣工：“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朕纘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事无大小，周思详虑，求其见诸施行，实可以有济天下者。”^① 治理国家，是尚虚，还是务实？他的观点非常鲜明，那就是务实，注意吏治民生。他要求臣下，“筹国是，济苍生”^②。学校教育要“实行”、“文风”两者并重^③。他的尚实，就是要求君臣共同关注国家大计，去解决民生、吏治的实际事务。

务实除虚，必然反对沽名钓誉。雍正帝在元年正月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发布上谕，指明他们的职责及对他们的要求，谕总督：“朕观古之纯臣，载在史册，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实至而名亦归之，故曰：名者实之华。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给按察使的谕旨同样说到名实问题：“迩来士大夫好云‘名实兼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第238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折朱批，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③ 《清世宗实录》卷三，第70页。

收’，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①他对官场中流行的名实兼收异常愤慨，一针见血地指明众多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是“肥家”，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所说的“名”，是官爵，是钓誉，不是由于实心实政而赢得的美名。他分清为一己之利的“名实兼收”的“名”与“实”，与为政务实以及由此而得名的“名”和“实”，是两种名实观，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惟其如此，才可能实现为政务实。

如果为政不务实，不仅是嘴上花架子，而是沽名钓誉，损公肥私，所以务实，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正事的同时，必须反对沽名钓誉的“名实兼收”，雍正帝不只是有为政务实的思想，还有实施的方针。

(3) 严猛为治的思想方针。宽仁与严猛，常常是对立的，康熙帝为政宽仁，雍正帝要变革，就不能温和仁爱理事了。他认为宽仁与严猛的采取，应当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②他认识到即位时的情形是：“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③。因此要舍弃宽仁，选择严猛治国方针。为此指示云贵总督鄂尔泰施政：“且猛做去，‘宽’之一字乃上天之恩，若容宽时得有可宽之日，乃尔我君臣之大福，天地神明之殊恩也。”^④又在云南巡抚杨名时奏折上批写：“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此诚圣人千古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三，第75页。

② 《上谕内阁》，雍正七年七月初五日谕。

③ 《上谕内阁》，雍正七年五月初五日谕。

④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折朱批。

之名言也。”^① 杨名时主张宽仁，雍正帝企图说服他。在雍正帝看来，能够实行宽政，是上天的恩赐，而他继承的时代百弊丛生，哪里可以施行宽仁之政，只好照着严猛去做，等到改革成功了，再恢复到宽政方面来。政治改革，要同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要剔除守旧观念，太温和了就难于做到，采取严猛的方针政策为势所必然。当然过于严猛则会变为残刻，成为另外一种弊政。严猛之政就是执行得适当，也会遭到沽名钓誉者的责骂，所以它是同为政务实紧密联系在一起。

(4) 强调忠君观念与反对朋党。雍正帝始终反对宗室结党，他从朋党中走出来，深知它的祸国乱家的巨大危害，而且视线远非皇族之内，放大到官僚和绅衿范围。他说人臣应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若敢于“树朋党，各循其好恶以为是非”，“是罔上行私”，犯了背叛君上的不忠之罪。又说人臣结党，讥讪朝政，扰乱君主之视听，坚持既定之策。至于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则干预了人主用人去人的权柄。一句话，朋党扰乱朝政，妨碍君权的充分发挥，所以他说：“朋党之恶，可胜诛乎？”^②

(5) 人治观念与励精图治。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奏请划一律例条款，颁示天下。雍正帝答复说：所奏“未尝不是，但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文弄法，正自不少。……虽条例划一，弊终难免。”^③ 法令制度和制定法令的人，两者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雍正帝把后一方面看得更重要。他认为善法也得守法的人来执行，若碰到坏人反倒被他利用为“贪营巧取”的工具^④。他又认为法久必弊生，故

① 《朱批谕旨·杨名时奏折》，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折朱批。

② 《清世宗实录》卷六，第133页。

③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66页。

④ 《清世宗实录》卷八九，第192页。